

河南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六十年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 郑州市 450000)

关键词: 河南; 龙山时代; 早期青铜时代; 考古学文化; 发现与研究

摘要: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 在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 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 对以中原为中心的 trends 的形成和夏王朝的建立,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 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 将有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机制、动力和规律等问题作持续的新的探索。

Key words: Henan; Longshan Age; early Bronze Ag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Abstract: Henan is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Longshan Age and the early Bronze Age, the Henan Longshan Culture and the Erlitou Culture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endency of centering o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Xia Dynasty. To review and sum up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investigating the Henan Longshan and Erlitou cultures in the past 60-od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ill be helpful to continuing and renewing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motive force and development law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formation.

一、前言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 在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 对以中原为中心的 trends 的形成和夏王朝的建立,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龙山时代, 严文明先生讨论了各地的龙山文化, 针对它们不仅年代范围基本相同, 而且由于技术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明成就导致了社会面貌的变化, 提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时代概念——龙山时代。关于早期青铜时代, 严文明先生指出: 可以考虑把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分为两期: 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 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之后, 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同时开始了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整个时代, 应是中国的早期青铜时代^[1]。现有材料表明: 在龙山时代, 河南的龙山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是探索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的文化遗存, 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 即为学术界所指的夏文化遗存, 而河南的龙山文化晚期可能已是夏文化的早期遗存。

河南的龙山文化的发现可追溯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1931 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 第一次发现了小屯(殷商)、龙山、仰韶三种文化层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后冈“三叠层”^[2]。1931~1936 年, 史语所在安阳周围以及河南等地, 进行较广泛的调查和发掘, 其中发掘的遗址有安阳候家庄高井台子、同乐寨, 浚县辛村、大赭店, 广武青台峨眉岭, 永城造律台、黑垆堆等。由此, 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有了更多的了解^[3]。但河南的龙山文化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和研究则大部分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进行的; 二里头文化当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要发现之一。本文着重对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发

现与研究做一简要概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河南的龙山文化

(一) 概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以及周边省份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从而对于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特征、分期、分区、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等,有了较多的了解。1984 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指出:关于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认识,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扩大了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初步解决了它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澄清了山东龙山文化的渊源,明确了它与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并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结合夏文化的探索,对河南龙山文化作了初步分区,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了某些分区与夏商族的关系;探索了陕西龙山文化与齐家文化、先周文化的关系;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初步探讨等^[4]。

河南的龙山文化或曰“中原龙山文化”,主要是指分布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因其分布地域较广,其呈现的文化面貌又有所不同,考古界一般将其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或文化。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类型或文化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和变化。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前期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分为以豫晋陕三省交界为中心的潼关区,以洛阳、郑州为中心的郑洛区,另外在豫北冀南有永年台口一期文化。后期则以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分别命名。其中又将“河南龙山文化”分为五个地区性类型,即王湾类型、后冈类型、王油坊类型、三里桥类型、下王岗类型^[5]。《河南考古四十年》

将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分为:豫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豫中地区早期龙山文化。将河南龙山文化分为六个类型,即王湾类型、后冈类型、王油坊类型、郝家台类型、下王岗类型、三里桥类型^[6]。《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将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分为:豫西、豫中西部嵩山、郑州、豫东、豫南等五个地区的早期龙山文化。将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分为: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后冈类型、王油坊类型、孟庄类型、下王岗类型^[7]。上述成果大体反映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中原龙山文化的认识。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指出:在黄河中游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是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体的诸遗存,有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类遗存、段寨中期类遗存、台口一期类遗存等。将中原龙山文化时期诸文化分为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陶寺文化和客省庄文化,还有三里桥类遗存、下王岗类遗存^[8]。其成果大体反映了时下考古学界对中原龙山文化的主要认识。

显然,由于诸学者对河南的龙山文化或曰中原龙山文化的认识不尽相同,所以诸类型或文化的内涵和名称也有所差异,是将上述遗存称为“类型”或是“文化”,实在是见仁见智之举。综合上述认识,可将龙山时代河南的龙山文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前期为龙山文化早期,后期为龙山文化中晚期,而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名称和材料拟参考《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并同时参考其他研究成果。

(二) 河南的龙山文化早期

1. 发现概况

河南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可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代表。1953 年庙底沟二期文化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1956~1957 年进行了发掘,遗址的主要堆积是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早于

一般常见的河南龙山文化,是河南龙山文化中较早的遗存^[9]。1959~1960年王湾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处于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因其主要特征是龙山文化的,可认为是早期龙山文化^[10]。

2. 文化特征与分类

河南的龙山文化早期陶器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例,以夹砂粗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细泥黑陶较少,还有少量的蛋壳黑陶。陶器制法主要用泥条盘筑法,口沿用慢轮修整。许多器物用接底法,即分别制成器底和器身,然后接在一起。陶器除素面外,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为绳纹及附加堆纹,方格纹极少,还有镂孔及彩绘等。炊器较多的是三足器,有盆形鼎、鬲及直口鼓腹罐形甗等。陶灶为筒形,釜为圆底形罐。罐多呈直筒形,还有大口折腹豆及直口深腹折肩小口尖底瓶^[11]。

河南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根据其不同的特征,大体可分为豫陕交界区、豫中区、豫东区、豫北冀南区。

(1) 豫陕交界区庙底沟二期文化

豫陕交界区的陶器都较厚重,较多使用篮纹和附加堆纹,罐是直筒形的,外加多条附加堆纹,小口广肩深腹罐、甗和鼎较普遍,鼎多盆式的。

陕县(今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遗址面积24万平方米,于1956年和1957年两次发掘面积4480平方米。堆积分两期,一期为仰韶文化、二期为龙山文化遗存^[12]。2002年又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18000平方米,主要遗存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有房基、陶窑,遗物有陶器等^[13]。

灵宝涧口遗址,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1987年发掘面积291平方米。堆积分三期,第一期 of 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第

二、三期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14]。

(2) 豫中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

豫中区以嵩山为中心,陶器较之豫陕交界区的轻薄,较多使用篮纹和绳纹,堆纹较少,普遍使用瘦长形的罐和高把镂孔豆,陶鼎较多,有盆式、罐式和钵式的。

洛阳王湾遗址,遗址面积2万平方米,1959~1960年发掘面积3620平方米。堆积分分为三期,第一期 of 仰韶文化,第二期 of 庙底沟二期文化,第三期 of 龙山文化^[15]。

孟津妯娌遗址,遗址面积1万余平方米,1996年发掘面积3200平方米。主要堆积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可分三期^[16]。

偃师滑城遗址,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62年试掘面积不详。堆积可分龙山文化早期、商代等遗存^[17]。

偃师二里头遗址,该遗址以发现丰富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而闻名于世。1978年在遗址中部发现龙山文化早期灰坑^[18]。

郑州大河村遗址,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1972~1987年进行了21次发掘,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堆积可分六期,第一期至四期为仰韶文化,第五期为龙山文化早期,第六期为龙山文化晚期^[19]。

郑州站马屯遗址,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1984年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堆积可分三期,第一期 of 龙山文化早期,第二、三期 of 龙山文化中晚期^[20]。2009~2010年又对该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3404平方米,主要是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遗存,也有龙山文化遗存^[21]。

登封告成北沟遗址,遗址面积2000余平方米,1979年发掘面积40平方米。发现龙山文化早期灰坑^[22]。

禹州瓦店遗址,遗址东台地面积4万平方米,1980~1982年发掘面积700余平方米。遗存可分四期,第一期 of 龙山文化早期,第二期 of 龙山文化中期,第三、四期为龙山文化晚期^[23]。

(3) 豫东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

郸城段寨遗址, 遗址面积 7000 平方米, 1979 年发掘面积不详。堆积分为三期, 早期与大汶口文化相似, 中期为龙山文化早期, 晚期为龙山文化晚期^[24]。

鹿邑栾台遗址, 遗址面积约 7000 平方米, 1987 年发掘面积 460 平方米。遗存可分六期, 第一期为龙山文化早期, 第二期为龙山文化中晚期, 第三期为岳石文化, 第四至六期为商文化遗存^[25]。

(4) 豫北冀南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

汤阴白营遗址, 遗址面积 3 万平方米, 1975~1978 年先后三次发掘面积 1830 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 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为龙山文化早期^[26]。

3. 文化分期与年代

有学者将龙山文化早期或曰庙底沟二期文化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主要遗址有陕县庙底沟二期、平陆盘南村、王湾二期晚和华阴横阵村, 后期有偃师滑城、二里头 IV 区 H1^[27]。关于龙山文化早期的分期, 还有几种观点, 有学者参考各家意见, 将其大致分为早晚两期, 豫中、豫东、豫北冀南因材料较少, 尚未分期^[28]。

关于龙山文化早期或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的起止时间有几种估计, 有学者综合这些意见, 认为“整个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 2900 年至前 2600 年。”豫中地区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相同。豫东、豫北冀南的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尚缺碳十四测年数据^[29]。

4. 社会经济文化

(1) 聚落、建筑和墓葬

龙山文化早期的房屋建筑在庙底沟、王湾、涧口、站马屯、白营等遗址都有发现, 如庙底沟的房屋是圆形半地穴式的, 居住面中部和房周围有柱洞, 穴底涂草拌泥和白灰面, 有壁炉, 为圆形攒尖式的房子。居住址

内的灰坑大多是袋形的, 还有水井。

关于当时的人口规模, 有学者研究认为: 龙山时代早期的人口规模在 1157000 人左右, 平均密度为 7.01 人/平方千米。河南龙山时代早期的聚落群内部不仅有等级之分, 而且聚落之间的联系也较以前密切, 在嵩山地区的聚落群之间可能已经有了主从之分^[30]。

埋葬习俗, 庙底沟遗址有氏族公共墓地, 一般为单人竖穴墓, 仰身葬, 随葬品很少。王湾遗址发现有土坑葬和瓮棺葬。妯娌遗址发现 55 座墓葬, 为氏族公共墓地。有灰坑葬, 可能是一种葬俗, 也可能另有用意, 利用灰坑埋人的现象, 在河南的龙山文化中是常见的。

(2) 经济技术与环境资源

龙山文化早期的农业生产、手工业和畜牧业生产已比仰韶文化时期进步。农业是龙山文化早期的主要生产部门。生产工具有了改进, 虽然仍使用打制石器, 但磨制石器已增多, 并使用了一些新工具。作为砍伐工具的石斧比仰韶文化时期的厚重, 挖土工具的木耒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 扁平长方形平头石铲是挖土工具。出现了更先进的收割工具, 如长条半月形石刀和石镰等, 并开始使用蚌镰。

家畜饲养有猪、狗, 牛和羊可能也已作为家畜驯养, 还有鸡, 以猪的数量最多。家畜饲养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 农业生产提高了, 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遗址中发现许多石、骨、蚌镰及网坠等渔猎工具, 还有鹿、狐、虎及黄颡鱼的骨头, 表明渔猎在当时的生产活动中仍占一定的比重。

制陶业中已使用轮制技术, 陶窑由火口、火膛、火道及窑室组成。

河南龙山时代早期部分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前期相比曾经有过降温事件。在气候环境、资源条件相对较为优越的条件下, 生存空间的扩展造成了人口规

模的进一步扩大^[31]。

(3) 精神文化

龙山文化早期的一些遗址发现在白灰面墙裙上画有红色彩带,应是原始建筑装饰艺术的萌芽。还发现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原始乐器——两音孔陶埙等。

(4) 社会发展阶段

从河南龙山时代早期房址和墓葬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聚落内部存在着四级社会组织结构,即核心家庭——大家庭——家族——宗族。在聚落内部核心家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同社会组织的分化较前期进一步加剧。河南龙山时代早期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内部不平等现象已经十分显著,处于分层社会阶段^[32]。有学者认为:河南的龙山文化早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以前有了大的进步,尤其农作物的产量增加。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这时的葬俗盛行单人葬,一般没有随葬品,应是当时的贫民墓葬。虽然尚未发现高规格的贵族,但这时已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差异。龙山文化早期可能已处于父权制氏族社会的晚期,走到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前^[33]。

(三) 河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

1. 发现与研究概况

紧接河南的龙山文化早期诸遗存之后的是以王湾三期文化和后冈二期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在河南发现较早,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安阳小屯和永城王油坊和造律台等遗址进行过发掘^[34],有学者认为:当时是与在山东发现的龙山文化一起被笼统称为龙山文化,后来为了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别又称河南龙山文化或中原龙山文化。其实,无论河南龙山文化或中原龙山文化都是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存的总称,而非专指单一的文化遗存。几十年来,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认识在不断

变化发展中^[35]。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三叠层堆积,从而证明龙山文化是晚于仰韶文化早于小屯商文化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36]。1949年以后,在河南、陕西、河北和山西等地陆续发现类似龙山文化的遗存,新资料的发现,深化了学术界对龙山文化的认识。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把龙山文化限定在黄河流域,并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37]。同时,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表明,像龙山文化一样,河南的龙山文化也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演变系统。20世纪80年代,河南龙山文化被分为王湾类型、后冈类型、王油坊类型、三里桥类型、下王岗类型五个地方类型^[38]。龙山时代的提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严文明先生认为龙山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时代即“龙山时代”的代表,不仅应该把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同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相区别,豫北地区以后冈二期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与豫西地区以洛阳王湾三期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面貌也不相同,也应该把两者区分开来,前者称为“后冈二期文化”,后者称为“王湾三期文化”^[39]。

2. 文化特征与分类

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的共同特征是大量使用灰色陶器,也有少量的红陶和黑陶,使用轮制技术,以绳纹、篮纹、方格纹及附加堆纹等装饰陶器,常见器形有鼎、鬲、鬶、甗、深腹罐、杯、盆和碗等。

这一时期的遗存分布在河南、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及安徽西北部等地,因其分布地域较广,各地区之间又有一定的差别,又可分为五个地区性的类型。

(1) 王湾三期文化

分布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地区,主要遗址有洛阳王湾、姪李,孟津小潘沟,偃师高崖,临汝煤山,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等。

王湾三期文化陶器纹饰多方格纹，次为篮纹及绳纹。常见器形有圜底罐形鼎、束腰盆式甗、平沿鬻（有空足和实足两种）、深腹盆式甗、直口鼓腹双耳罐、双腹盆、大口鼓腹小平底罐、碗、带耳杯及澄滤器等，极少见鬲、高圈足盘及大口平底盆等。由于王湾三期文化位于河南的龙山文化中心地区，它的陶器代表了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器形。只是嵩山东南部王湾三期文化与豫北冀南后冈二期文化、豫东王油坊类型、豫南鄂西北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比邻，故其中有这几个文化中常见的器形，如大口浅腹平底盘、镂孔高圈足盘、麻花式把的鬻形器和漏斗形刻槽盆等。

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及夏文化的探索，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及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与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地域及年代是大体相同的，而王湾三期文化的分布地域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也是大致吻合。在地层关系上，王湾三期文化又被二里头文化一期所直接叠压。因此学界在对比了两者的陶器器形及纹饰后，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王湾三期文化发展来的，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可归入夏文化范围之内^[40]。但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划入夏文化范围之内^[41]。

洛阳王湾遗址，遗址面积 2 万平方米，1959～1960 年发掘面积 3620 平方米。堆积分为三期，第一期 of 仰韶文化，第二期 of 庙底沟二期文化，第三期为龙山文化^[42]。

登封王城岗遗址，遗址面积 50 万平方米，1976～1981 年发掘面积 8575 平方米。堆积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可分五期，遗迹中有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其中西城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城内有 13 个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和几块夯土残基址。发掘者联系在王城岗遗址东面发现有

“阳城”铭陶量的东周阳城，结合文献“阳城”的地望，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可能是夏代的“禹都阳城”^[43]。2002 年和 2004 年又对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1024 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等。龙山文化遗迹发现一座面积 34.8 万平方米的由城墙和城壕构成的大城，而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角，在大城内发现祭祀坑和若干夯土基址。发掘者根据新材料，将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原分五期调整为前后两期三段，前期以小城为代表，推测为鲧作之城；后期以大城为代表，推测为“禹都阳城”^[44]。（彩版五，1）

禹州瓦店遗址，遗址面积 100 万平方米，1980～1982 年发掘面积 700 平方米。遗存分四期，第一期为龙山文化早期，第二期至四期为龙山文化中晚期^[45]。1997 年、2007～2010 年又先后三次发掘，发掘面积 1597 平方米。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可分为三期，遗迹中有面积 40 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环壕内有面积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数座、祭祀坑和奠基人骨架十多处。发掘者根据遗址规模、重要遗迹和遗物，推测瓦店遗址有可能与夏代禹、启的阳翟城和钧台之享有关^[46]。（彩版五，3）

新密古城寨遗址，遗址面积上百万平方米，1998～2000 年三次发掘面积不详。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还发现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遗存。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可分为四期，遗迹中有龙山文化晚期城址，面积 17 万平方米。城址内发现由 F1 和 F4 组成的面积 3120 平方米的夯土建筑^[47]。（彩版五，2）

汝州煤山遗址，遗址面积 20 万平方米，1970 年、1975 年、1987～1988 年先后四次发掘面积约 950 平方米。堆积可分四期，一、二期为龙山文化，三、四期为二里头文化^[48]。

鄆城郝家台遗址，遗址面积 7 万平方

米, 1986~1987年发掘面积3213平方米。堆积分为八期, 一期至五期为龙山文化遗存, 其中有面积3.3万平方米的城址; 六期至八期为二里头文化遗存^[49]。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 遗址面积18万平方米, 2004~2005年发掘面积6200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存。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由城墙和城壕构成, 面积约4.1万平方米^[50]。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类, 学术界有着不同的意见, 有学者将其划分为“汝洛型”和“郑州型”^[51], 或“王湾类型”和“王城岗类型”两个类型^[52], 有学者分为“王湾类型”、“煤山类型”、“郝家台类型”三个类型^[53], 有学者将其分为“王湾类型”和“郝家台类型”两个类型^[54]。我们注意到以嵩山为中心分布的王湾三期文化, 在嵩山西北和嵩山东南确实存在差异, 嵩山西北伊洛河流域可以“王湾类型”为代表, 嵩山东南颍汝河流域可以“瓦店类型”为代表。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 以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两遗址的系列碳十四测年数据公布较多且重要。王湾三期文化中最早的王湾H79的¹⁴C年代为BC2465~BC2143年, 最晚的瓦店三期YHW97T4H24的¹⁴C年代是BC1880~BC1680年, 即由公元前24世纪至前18世纪^[55]。

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 学者们意见多有不同, 有的分为两期^[56], 有的分为三期^[57], 有的分为两期五段或六段^[58]。《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根据目前发现的各遗址有关地层关系和文化发展序列, 把王湾三期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王湾三期为代表, 还有瓦店早期等。中期以煤山一期为代表, 还有王城岗一至三期, 瓦店中期, 郝家台一、二期等。晚期以煤山二期为代表, 还有王城岗四、五期, 郝家台三至五期^[59]。虽然各家的分期结果并不相同,

但就现有材料而言, 这个分期还是有代表性的。

(2) 后冈二期文化

分布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以及山东西部等地, 主要遗址有安阳后冈、大寒南岗、八里庄、汤阴白营、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潘汪、永年台口及茌平尚庄等。后冈二期文化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 其次为篮纹及方格纹, 常见的器形有带把或不带把的鬲、甗、束腰盆式甗或罐式甗、罐形鼎、大口鼓腹小平底罐、直口鼓腹双耳罐、腰有两耳的大口深腹盆、双腹盆、大口平底盆、浅腹盆式甗及双耳覆斗式盖等, 还有山东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鸟头式或V字式鼎足和长流鬻等。少见平沿鬻及澄滤器等。

安阳后冈遗址, 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 1931~1934年、1959~1979年先后八次发掘, 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堆积主要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60]。

汤阴白营遗址, 遗址面积3万平方米, 1975~1978年先后发掘三次, 发掘面积1830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 可分早、中、晚三期, 早期为龙山文化早期, 中、晚期为龙山文化晚期^[61]。

辉县孟庄遗址, 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 1992~1995年经多次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遗存, 龙山文化遗迹中有面积16万平方米的城址^[62]。

关于后冈二期文化的年代, 后冈F19中下层的¹⁴C年代是BC2852~BC2364年为最早, 辉县孟庄VⅢT114H418的¹⁴C年代是BC1913~BC1679年为最晚, 即由公元前27世纪至前18世纪^[63]。

关于后冈二期文化的分期, 可以后冈遗址龙山文化遗存早、中、晚三期为代表。

(3) 王油坊类文化遗存

分布在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这一地区工作做得较少, 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永

城王油坊及解放前发掘的永城造律台和黑孤堆等地。这一类型的陶器纹饰以方格纹为主,其次为篮纹和绳纹。常见器形有罐形鼎、甗、大口圆腹罐、镂孔高圈足盘、大口平底盆、长流鬻和杯等,缺少鬲、罍、直口鼓腹双耳罐、平口鬻等器。有学者认为后冈二期文化和王油坊类文化由于与山东龙山文化的接壤和交流,在其陶器群中出现了后者的一些器形,如长流鬻、鸟头式或 V 字式鼎足的盆形鼎等。据文献记载,豫北、冀南、豫东和鲁西南等地曾是商族先公活动的地区,因此推测这里的龙山文化可能与先商文化有一定的关系^[64]。

永城王油坊遗址,遗址面积 1 万平方米,1936 年、1977 年先后三次发掘面积 800 余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分早、中、晚三期^[65]。

鹿邑栾台遗址,遗址面积 7000 平方米,1987 年发掘面积 460 平方米。堆积可分六期,第一期为龙山文化早期,第二期分早、晚两段,皆为龙山文化晚期,第三期为岳石文化,第四期至六期为商周文化^[66]。

淮阳平粮台遗址,遗址面积 5 万平方米,1979~1980 年发掘面积 1600 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可分四期,遗迹有面积 3.4 万平方米的城址^[67]。

杞县鹿台岗遗址,遗址面积 1.4 万平方米,1989~1990 年发掘面积 714 平方米。堆积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先商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文化遗存^[68]。

关于王油坊类文化遗存的年代,王油坊 H40 的¹⁴C 年代是 BC2580~BC2142 年为最早,柘城山台寺 T2④D 的¹⁴C 年代是 BC1874~BC1626 年为最晚,即由公元前 24 世纪至前 18 世纪^[69]。

关于王油坊类文化的分期,可以王油坊遗址龙山文化遗存早、中、晚三期为代表。

(4) 三里桥类遗存

分布在豫晋陕三省的交界地区,主要遗

址有陕县三里桥、平陆盘南村、华阴横阵村等,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次为篮纹和方格纹,其中双腹盆、平沿鬻、深腹盆式甗、单耳或双耳杯为王湾三期文化常见,而单耳或双耳鬲、单耳或双耳束颈深腹罐、长颈深腹罐、罐形罍等则是陕西龙山文化中常见。

陕县(今三门峡市)三里桥遗址,遗址面积 18 万平方米,1957 年发掘面积 1525 平方米。堆积主要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存。2005 年发掘面积 3600 平方米,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70]。

(5) 下王岗类遗存

分布在河南西南部丹江流域,龙山文化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常见陶器有宽扁长方形或扁三角形足的罐形鼎、大口深腹罐、浅盘圈足豆、高足杯和陶支座等,有较多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后期陶器的陶质以灰陶较多,黑陶次之,器表多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常见器形有侈口深腹扁棱足鼎、深腹圆底罐、高把浅盘豆、小口广肩罐、盂形器、双耳罐式甗及杯等。

淅川下王岗遗址,遗址面积 6000 平方米,1971~1974 年发掘面积 2309 平方米。堆积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遗存。2009 年发掘面积 1200 平方米,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71]。

淅川黄楝树(龙山岗)遗址,遗址面积 14 万平方米,1965~1966 年发掘面积 980 平方米。堆积主要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2008~2010 年的考古工作中,遗址面积被认定为 20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8000 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遗存^[72]。

淅川下寨遗址,遗址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2009~2010 年发掘面积 6000 余平方米。堆积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等遗存。其中龙山文化遗存包括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两

种^[73]。

3. 社会经济文化

(1) 聚落、建筑和墓葬

龙山文化中晚期,生产的发展,促进人口的繁殖,一个聚落遗址中房屋的数量增多了。建筑业出现几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分别是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在中原,人们开始使用土坯砌建房子,烧制石灰涂抹室内地面和四壁。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白灰面的建筑。房屋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的地面建筑。还有半地穴式的房址,其平面有圆形或吕字形的。在房屋附近发现婴儿墓,可能与房屋建筑时举行的宗教仪式有关。住址周围有灰坑。灰坑有直筒形和袋形的,还有呈漏斗形的,这些灰坑一般为储藏东西的窖穴。

这时已发明了凿井技术。人们可以在远离江河湖泊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如交通和贸易物流枢纽、重要原料产地、军事防御要地等——定居或驻守下来,开辟新的生活居地,这是人类对自然控制的一大发明。

防御设施,解放前曾在安阳后冈龙山文化层中发现过夯土墙。夯土技术的普及,人们淘汰了那种低矮潮湿的半地穴式房子,改为地面建筑的住宅,很多房子还建在夯打起来的台基之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鄆城郝家台、新密古城寨、平顶山蒲城店、辉县孟庄等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的城址。其中王城岗城址面积为34.8万平方米,古城寨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孟庄城址面积12.7万平方米,平粮台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蒲城店和郝家台城址面积均为3万余平方米。而有的中心聚落如瓦店遗址有宽阔的城壕环绕,遗址面积可达100多万平方米。这些大型城址和中心聚落的出现,固然是新技术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动员、组织实施这类大型工程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

埋葬习俗,龙山文化时期居住址附近很

少发现墓地,当时的人们可能把死者埋在离聚落较远的地方。在一些遗址中也发现过零星的长方形竖穴墓,其中少数有随葬品。小儿用瓮棺葬,埋在房屋附近或房基下,有的可能与房屋建筑时宗教活动有关。

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等遗迹中常发现人骨架,有的凌乱,有的整齐。有学者将这些见于各类遗迹中的死亡者,称之为“异类葬”。并认为龙山文化“异类葬”较流行,多与人牲有关。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方面^[74]。

关于当时的人口规模,有学者研究认为:河南龙山时代晚期的人口规模在2094000人左右,平均密度为12.69人/平方千米。根据不同人口规模的聚落分布情况来看,河南龙山时代晚期以豫西、豫中、豫北等为中心形成几个大的聚落群。不同聚落群之间在人口规模以及分布格局上存在较大差异。河南龙山时代晚期在聚落形态上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城址的大量出现,这些城址位于各聚落群的中心位置,周围有数量不等的各级聚落分布。城址人口规模上的差异,只是反映了位于城内的上层人物的多寡。河南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形态的发展表明,聚落之间的等级差异十分明显,城乡分化进一步发展^[75]。

(2) 经济技术和环境资源

龙山文化中晚期,无论农业生产或畜牧业生产都有了较大的发展。陶器轮制技术使用已较普遍,模制及泥条盘筑法仍使用。陶窑在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都分布在居住址附近。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发达,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出现了比前一阶段较多的剩余产品,私有制进一步发展了。

有学者指出:这一阶段的手工业主要门类有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蚌器、漆木器的制作等,还出现了铜器的制作。其中石器和

陶器的制作,是人们劳作和生活的两项重要的技术。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也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这必定引起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和多样化,促进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复杂化起来^[76]。

关于河南龙山时代的经济技术和环境资源情况,可以王城岗^[77]、瓦店^[78]的材料为例。通过模拟实验,推测用当时的石质生产工具来修筑王城岗这样一座 30 多万平方米规模的城址,所需劳力远非王城岗聚落本身所能提供,必然需要征集更大范围里其他聚落的劳力来共同完成。因此,在龙山时代的颍河上游地区存在一个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而这个聚落群的内部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王城岗城址北城壕地表高差 4.35 米,但城壕底部高差不足 0.40 米,可见龙山文化晚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一定的测量技术,这种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城壕的设计和开挖,联系到古代传说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具备一定的测量和施工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增加了人们对夏禹治水事迹的可信度。

对木炭碎块的研究得知:龙山文化时期王城岗遗址周围分布有大量的阔叶树栎林、其他阔叶树种和刚竹属,其中,有许多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树种,表明当时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王城岗具有亚热带气候特点,龙山文化时期亚热带北界比现今偏北。

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活动。生产工具是石制的,但磨制得比前一阶段精细,打制工具已极少见。大量使用蚌器。木耒是一种挖土工具。当锄用的有扁平长方形石铲和方形厚壳蚌、骨锄。另有三角犁形器。这些改进了的生产工具,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收割工具有长方形穿孔石刀、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和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劳动收获量的增加。农业生产水平显然

比前一阶段提高了。石斧是砍树的工具,小型的石镑和石凿是木工工具。通过对王城岗遗址出土部分石器不同生产阶段产生废坯的观察,大致复原了石铲、石刀和石斧的制作工序。

通过对王城岗遗址中诸遗存土样的浮选物鉴定可知,龙山文化时期有粟、黍、稻、豆种等作物,野大豆、藜种、紫苏、菊种、土荆芥等植物。瓦店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两大类,植物种子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和黍亚科、豆科、藜科、莎草科、大戟科、葫芦科、蓼科、苋科等常见的杂草,以及野大豆、紫苏、葡萄、水棘针、酸枣、野山楂、桃等。瓦店龙山文化时期五种农作物,即粟、黍、小麦、大豆和稻谷,这与史料所记载的“五谷”之数恰好一致,瓦店人群以粟、黍为主,兼营稻谷、大豆和小麦多种农作物种植方式。另外大量出土紫苏,紫苏具有药用和食用等多种价值,龙山文化时期的瓦店人对此是否有意为之,值得注意。

农业的发达,推动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增加了家畜的品种和数量。畜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猪的数量最多,有的墓葬用猪头随葬,这虽是一种宗教习俗,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动物考古材料表明:王城岗龙山文化时期无脊椎动物有蜗牛、中华圆田螺、圆顶珠蚌、丽蚌、蚬等,脊椎动物有鸟、豪猪、鼠、家鼠、啮齿动物、兔、狗、熊、猪、梅花鹿、牛、羊等。瓦店龙山文化时期家畜有猪、黄牛、绵羊、狗等,居民获取肉食以猪为主,牛骨是当时制作骨器的主要原料。猪、牛、羊在当时的祭祀活动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动物遗存分析,表明瓦店龙山文化时期野生动物比例呈逐步下降趋势,家畜成为先民获得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渔猎业为辅助性食物提供来源。狩猎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骨、蚌铲。主要猎获物有鹿、麋、兔和獾等。遗址中常发现骨鱼

钩、石和陶的网坠等捕鱼工具，还有大量的田螺、蚌壳及鱼鳖等食余弃剩物。

瓦店龙山文化时期的精美遗物中，玉器是透闪石软玉，其原料为本地不见，可能交换自外地。瓦店在使用羊肩胛骨外，还使用牛肩胛骨作大卜骨引人注目，占卜祭祀活动的存在充分显示瓦店遗址的高等级。白陶器成分为高岭土，烧制白陶的技术为龙山文化晚期才出现于颍河中上游地区，白陶器仅在大型遗址中发现，似乎表明其技术很可能为当时社会上层所垄断。精致的磨光黑陶主要制作精美和纹样别致的高档陶器，包括胎极薄的蛋壳陶、花纹陶和大型磨光黑陶，其制作技术高超，很可能也垄断在高等级的聚落中。发现列觚这种特殊用途陶器，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瓦店聚落所发现的成套量器列觚是否与赋税制度或产品的再分配亦或酿酒有关，但很明显瓦店聚落在颍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群中占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

（3）精神文化

龙山文化中晚期宗教习俗，在许多遗址中发现大量卜骨，是用猪、羊、鹿和牛的肩胛骨作成的，上有火灼痕。卜骨作为占卜用器，是三代文明的重要特质。遗址中卜骨的存在，可能表明这时已有在社会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专职巫师。还见有在灶的周围放着若干个人的头盖骨，这可能是一种猎头祭祀的习俗。

经过对瓦店龙山文化晚期环境范围内，东、西相对的两处建筑基址的形状、结构和包含物的分析，认为它们可能都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

（4）社会发展阶段

关于河南的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有一个时期只是笼统地认为它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由于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及夏文化的探索，重新引起了对它的社会性质的讨论。关于夏文化的上限，有两种不同的见解，有的

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有的则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已是夏文化。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如果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是夏文化，它已进入阶级社会；反之，则仍处于氏族社会阶段^[79]。

有学者指出：到公元前 2500 年前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从此以后，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辽河流域的地方文明却不同程度地沉寂下去了。中原地区却开始了激烈的变革，其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阶段的那些地方社会。直到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的建立的五六百年，是考古学分期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的晚期，又叫龙山时代，以各种矛盾的激化为特征，而从古史传说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尧舜时期。无论是社会经济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复杂化发展，还是社会生活分层化所引起的种种矛盾，都将导致一种权威的强制力量的出现，这便是所谓国家机器的东西。对于这个国家的形成过程，我们也称做社会的文明化过程^[80]。

三、新砦期遗存

（一）发现与研究概况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于 1979 年进行第一次发掘，发掘者认为新砦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81]。新砦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闻名。1999 年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其重要收获是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82]。2000 年对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王湾三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发掘者认为新砦期的上限可能是“后羿代夏”之前的夏代早期^[83]。2002 年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 70 万平方米，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是大型聚落遗址。同年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84]。（彩

版六, 1) 2003 年发现围壕与城墙^[85]。2004~2005 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墙角。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86]。

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是“新砦期”文化是否归入二里头文化中。有学者采取直接归入二里头文化的做法, 把新砦期文化遗存看作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偏早阶段^[87], 有学者使用中性概念“新砦期文化”^[88], 有学者提出“新砦文化”概念, 主张把学界所说“新砦期”与原先所定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合并成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89]。这里, 由于牵涉到考古学文化命名、考古学文化与王朝的对应关系等理论问题, 也由于大家在夏商文化界定等方面的歧见, 一时还难以达成共识。

(二) 文化特征和分类

新砦期遗存特征, 主要陶器纹饰以篮纹为主, 方格纹次之, 少量绳纹, 器形有折沿圜底罐形鼎、折沿平底深腹罐、折沿深腹盆、盆形甑、钵形刻槽盆、直领小口平底瓮、高领罐、折肩器盖、侈口平底盆、三足皿、鬻、素面钵、高柄豆、高领尊等。

新密新砦遗址, 遗址面积 70 万平方米, 1979 年、1999~2005 年先后 7 次发掘, 发掘面积不详。堆积主要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

巩义花地嘴遗址, 遗址面积不详。2003 年试掘, 2004 年正式发掘, 发掘面积不详。该遗址发现的新砦期遗存表明, 嵩山以北也有新砦期遗存^[90]。

(三) 分期和年代

就已发表的材料看, 在新砦期遗存中, 以煤山 H30 为代表的偏早遗存, 更多地具有王湾三期文化特征; 以新砦 H3、H7、H11 为代表的偏晚遗存, 则更多地表现出二里头文化特征^[91]。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经由新砦期过渡到二里头文化的观点, 经 1999 年对新砦遗址的发掘所再次得到证实。关于

新砦期的年代, ¹⁴C 测定的年代为 BC1850~BC1750 年^[92], 即公元前 19 世纪至前 18 世纪。

(四) 社会经济文化

新砦期遗存有大型城址、建筑基址、灰坑、墓葬等。刻划精美的龙形图案的陶礼器的存在, 表明这时已有成熟的精神文化活动。

经济技术与环境资源, 通过植物考古和对环境的研究, 新砦第一期(龙山文化)为温和较干燥气候, 植物以蒿属为主, 禾本科和藜属次之, 有少数松属和阔叶落叶树, 属于生长有稀疏松树和落叶阔叶树的暖温带草原植被。因气候较干燥, 河水量不大, 洪水对人类的威胁不大。有稻作农业, 但采集经济占有相当比重。新砦第二期(新砦期)发展为温暖湿润—温暖较湿润气候, 植物以蒿属为主, 禾本科和藜属次之, 属于生长有稀疏松树和落叶阔叶树并有较多湿生水生草本和蕨类的暖温带森林草原植被, 气候的显著变湿有可能导致大洪水的爆发。稻作农业更为发达。对人骨的同位素研究, 发现他们的饮食以小米为主, 这时的新砦遗址稻作农业发达, 但出自平民墓的人骨却以粗粮为食, 或许表明这与社会分层人群分级有关。陶器制作技术发达, 古耕地研究和石器岩性分析、玉器、红铜器的加工技术分析, 为了解新砦期遗存的聚落形态提供新资料^[93]。

四、二里头文化

(一) 发现与研究概况

二里头文化遗存是 1953 年最早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发现的^[94]。1956 年在郑州洛达庙村也发现了类似的古文化遗存, 内涵很丰富, 根据当时的认识, 将其年代归属于商代^[95]。由于洛达庙遗址是当时已知同类遗址中经正式发掘, 具有一定代表性, 因而人们曾将这类遗存称为“洛达庙类型”或“洛达庙类型商文化”^[96]。1959 年秋发掘二

里头遗址后,鉴于二里头遗址比洛达庙遗址规模更大,文化内涵更丰富,在同类文化遗址中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所以,自1962年起学者将这类古文化遗存更名为“二里头类型”^[97]。随着同类遗存的不断发现,对其认识不断深入,至20世纪70年代,遂将这类遗存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98]。“二里头文化”的概念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为代表的一类考古学文化遗存。

二里头遗址被学术界所重视,始自1959年夏徐旭生一行豫西踏察夏墟之行^[99]。同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分别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试掘^[100]。自1960年至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承担了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为学术界所熟知。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索、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等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二里头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整个遗址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区,墓葬、陶窑散见于各处。中心区有宫殿区、贵族聚居区、铸铜作坊区、祭祀活动区等。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王朝时期。(彩版六,2、3)二里头文化内涵在二里头遗址已有基本体现。

(二)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年代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二里头遗址分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的分期完全是建立在二里头遗址的分期基础上。至于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一类

遗存,有学者力主归入二里头文化中,实际上是把二里头文化拉长,这个意义上的二里头文化,与我们通常所说二里头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101]。

二里头文化中的¹⁴C数据,以二里头遗址、南寨遗址和洛达庙遗址发表的为多。偃师二里头遗址的¹⁴C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最早的年代为二里头VT17H29的BC1909~BC1740年,二里头文化四期最晚的年代为二里头VT13F内H87的BC1625~BC143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遗址新测的¹⁴C数据,二里头文化一期最早年代为二里头97VT3H58的BC1880~BC1840年,二里头文化四期最晚的年代为二里头97VT6的BC1564~BC1521年。即公元前18世纪至前16世纪。二里头遗址先后测定的¹⁴C数据有79个,其中分期明确的有48个,这些¹⁴C数据所反映的二里头文化的早晚年代值是基本一致的^[102]。所测¹⁴C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开始年代为公元前18世纪,其结束年代为公元前16世纪。

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在考古和历史学界的讨论由来已久,且尚未结案。二里头遗址发掘者等最初主张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后来渐渐发生转变,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属夏、晚期属商的学者日增。而部分研究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夏文化。通过反复讨论,大家的意见在逐渐靠拢,一些学者认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只是在其末尾进入商代,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不是夏文化的起始,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之前去寻找;另外一些学者把新砦一类遗存归入二里头文化,拉长二里头文化跨度以使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跨年相符,承认原先的二里头文化不足以完全填充夏代纪年框架。可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属于夏文化,夏文化包括“新砦期”文化,应是各种观点学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103]。

(三) 二里头文化分布与类型

根据目前的资料,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中心是河南省中、西部的郑州、洛阳地区和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了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北面可抵沁河岸旁。河南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约 250 处,经正式发掘的约 40 处。山西已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约 90 处,经过发掘的不足 10 处。在陕西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主要有华县南沙村、商州东龙山。以上遗址的分布范围,大体即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上述范围内,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总数约 350 处,经过正式发掘者约 50 处。

由于在夏商文化体系认识等方面的差异,学者对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划分有所不同。有学者简而划之,分为二里头、东下冯两个类型,认为豫北冀南地区同期遗存与二里头文化性质不同,属于先商文化“辉卫类型”、“漳河类型”;有学者则分做二里头、东下冯、下王岗、下七垣四个类型,把豫北冀南同期遗存划归二里头文化,并认为豫东地区可再划为一个类型;后来有学者提出再成立杨庄类型。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把二里头文化分做二里头、东下冯、牛角岗、杨庄、下王岗五个类型。这五个类型的幅员差别很大,内涵亦有区别,其中二里头类型是核心类型,也是原生类型,其他类型属于次要一级的派生类型^[104]。现依此,将诸类型介绍如次。

1. 二里头类型

二里头类型的分布,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包括郑州地区。重要遗址有偃师二里头、滎池郑窑、洛阳东干沟、巩义稍柴、伊川南寨、郑州大师姑、洛达庙、密县新砦、登封王城岗、临汝煤山等。陶器群主要特征为:炊器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有鼎和甗,一、二期不见鬲,三、四期有鬲,酒器

有爵、觚、盃、鬯、尊等,盛器有豆、三足皿、平底盆、簋、杯、壶、捏口罐、折沿盆、卷沿盆、缸、刻槽盆等。一期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细绳纹次之;二期纹饰以绳纹为主;三、四期流行绳纹,罕见篮纹和方格纹。二里头类型中有都城级遗址、大型宫殿基址、祭祀遗存、墓葬、窖穴、陶窑、水井、作坊等遗迹,有青铜器、玉器、漆器,以及丰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二里头类型是从当地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经由新砦期发展起来的,是二里头文化中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连续性最强的一个类型,充分展现了二里头文化的独特面貌和发展水平。

典型遗址除前述的二里头遗址外,还有伊川南寨、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遗址等。

伊川南寨遗址,遗址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1991~1992 年发掘面积 1450 平方米。堆积主要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遗存^[105]。

郑州大师姑,遗址面积 50 多万平方米,2002~2003 年发掘面积 500 多平方米。发现二里头二期偏晚阶段的城址一座,由夯土墙和城壕组成的城址面积达 51 万平方米^[106]。大师姑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年代和文化性质都十分明确的夏代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城址发展过程中的阶段空白。

新郑望京楼遗址,遗址面积上百万平方米,2010 年发掘面积 3000 平方米。发现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岗文化城址,这两座城址的外城面积达 168 万平方米。二里头文化城址已探明平面为方形^[107]。

2. 东下冯类型

东下冯类型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重要遗址有夏县东下冯、襄汾大柴、垣曲古城南关等。由于垣曲古城南关遗址南临二里头类型分布区,所以东下冯类型中较多体现了二

里头类型的特征。主要陶器有深腹罐、圆腹罐、甗、深腹盆等,少见鼎、捏口罐、四系壶、高柄豆、三足皿、卷沿盆、矮领尊等,显然有别于二里头文化。遗迹有壕沟、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遗物有铜、陶、石、骨、蚌器。东下冯类型的一些器物与当地龙山文化同类陶器似有联系,但尚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它与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或陶寺文化有承传关系^[108]。

3. 牛角岗类型

牛角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东的开封地区,重要遗址有杞县朱岗、牛角岗、段岗等。陶器主要有深腹罐、圆腹罐、鬲,还有大口尊、小口尊、捏口罐、卷沿盆、束颈盆、豆、刻槽盆、三足皿、鼎、簋、器盖等。遗迹中有房基、灰坑和墓葬。

杞县朱岗遗址,遗址面积 3000 多平方米,1989 年试掘面积几十平方米。堆积主要为二里头文化遗存,可分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三四期之交、四期),另有少量商周文化遗存^[109]。

杞县牛角岗遗址,遗址面积不详,1989 年发掘面积数十平方米。堆积主要为二里头文化遗存,可分四期^[110]。

杞县段岗遗址,遗址面积不详,1989 ~ 1990 年发掘面积 830 平方米。堆积分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遗存可分四期^[111]。

4. 杨庄类型

杨庄类型以驻马店杨庄遗址为代表,其分布范围尚不清楚,但二里头类型在其北面、牛角岗类型在其东北面、下王岗类型在其西南面,故大体勾勒出杨庄类型分布的范围。主要陶器有深腹罐、圆腹罐、鼎、甗、豆、爵、觚、盃、鬻、捏口罐、双耳壶、刻槽盆、大口尊、深腹盆、瓮等,不见鬲。遗迹中有壕沟、祭祀场所、墓葬、灰坑等。杨庄类型的不少文化因素来自淮河中上游的龙山文化。

驻马店杨庄遗址,遗址面积约 4 万平方米,1992 年发掘面积 486.5 平方米。堆积分三期,一期为石家河文化、二期为王湾三期文化、三期为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三段^[112]。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遗址面积 18 万平方米,2004 ~ 2005 年发掘面积 6200 平方米。二里头文化城址面积约 5.2 万平方米^[113]。

5. 下王岗类型

下王岗类型分布范围大体在豫西南地区,以淅川下王岗和下寨遗址为代表。主要陶器有圆腹罐、深腹罐、大口尊、高领尊、敛口盆、束颈盆、壶、豆、甗等,其垂腹罐、刻槽罐独具特色。遗物有陶、石、骨器,还见玉器、小铜器等。

淅川下王岗遗址,遗址面积约 6000 平方米,1971 ~ 1974 年发掘面积 2309 平方米。二里头文化遗存分二期^[114]。

淅川下寨遗址,遗址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2009 ~ 2010 年发掘面积 6000 余平方米。堆积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等^[115]。

在以上的五个类型中,资料丰富的只有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其他三个类型的材料均较缺乏。除了二里头类型的源流比较清楚、东下冯类型的去向基本清楚外,其他三个类型的文化来源和去向都不明了。

(四) 社会经济文化

1. 聚落、建筑和墓葬

有学者认为^[116]:二里头都邑兴盛期的人口至少应在 20000 人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 5000 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 1000 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整个都邑已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

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 12 万平方米，晚期筑有宫城，面积近 11 万平方米。这座始建于距今约 3600 多年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宫殿区的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都邑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平整。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中心区的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的道路外侧。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

有关埋葬制度，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墓葬 400 余座，墓葬一般为土坑竖穴墓，单人葬，墓穴多为南北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大部分头向北下葬。多数墓葬是分区分片的，同一区域的墓葬一般东西排列成行。出土有铜器、玉器、漆器和陶礼器的贵族墓葬，主要分布在宫殿区的周围。

2. 经济技术与资源环境

河南、山西西南部地区二里头文化人口规模的变化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气候环境变化的趋势，同时气候环境变化也给人口规模的发展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另外，根据人口分布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内部组织管理体系的增加，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出现使得人口的分布不再受地理环境、资源特点的严格限制，而更多的是服从政治统治的需要^[117]。

有学者指出^[118]：据已有资料分析，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栽培作物主要是水稻和谷子，还发现小麦、高粱、大豆等作物。二里头遗址中常见形制规整的窖穴，应是储藏物品的地方，其中有的应该就是粮仓。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农具，包括器身琢制、刃部磨制的石斧，长方形扁平磨光石铲或带肩石铲、骨铲、蚌铲，平面呈梯形的穿孔石刀、陶刀，背部呈弧形的石镰、蚌镰，另在坑壁和墓壁常见木耒的痕迹，分别用于砍伐、起土、中耕松土、除草和收割诸农事。作为农业之外的辅助经济，畜牧、渔猎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兽骨，其中以牛最多，其次是猪、羊、鹿等，完整的狗、猪、羊的骨架屡见不鲜。还发现过象牙器。这些动物大部分是家畜。二里头文化时期曾发现过不少铜镞和骨镞，形式多种多样，它们既可能是兵器，也可能用于狩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鱼具有多种。有骨鱼钩、蚌鱼钩、骨鱼镖、骨网坠、陶网坠、铜鱼钩等。这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通过多种渔具捕鱼。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有铜爵、罍、盃、鼎、铃、兽面纹牌饰、圆形牌饰、钺、戈、刀、镞、鱼钩、锥、凿、镑、锯、纺轮、泡等，共 18 个品类 104 件。在其他遗址也发现少量二里头文化青铜器，主要是工具、兵器等 20 余件。二里头文化的铸铜遗存在二里头遗址和东下冯遗址均有发现，遗物包括二里头遗址和东下冯遗址出土的铜渣、石范，遗迹为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冶铸作坊。二里头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其品类主要包括：刀、璋、钺、戚、圭、戈、柄形器等，其他还有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此外，绿松石制品中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等，也属于制玉手工业产品。二里头文化的漆器主要出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到目前

为止已发现数十件之多，其中器形明确者以觚最多，另外有匣、豆、盒、钵、勺、瓢状器等，还有漆鼓和漆棺。二里头文化陶器种类繁多，做工讲究。以灰陶为主，也有白陶、黑陶（包括黑皮陶）、红陶、褐陶等。在二里头遗址已屡屡发现纺织品的实物或其痕迹，主要见于铜器和玉器上，即铜器和玉器作为随葬品入葬时，有用纺织品将其包裹起来的习惯。骨器非常普遍地发现于二里头文化的各个遗址中，是当时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最常见的器具，其中农具有铲，工具有锥、凿、镑、刀，渔具有钩、镖，兵器有镞，生活用具有匕、叉、簪、针等。铲一般是用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或下颌骨制成，而匕则多是用动物的肋骨制成，其他的器具，是用动物的肢骨制造的。

目前尚未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酿酒作坊，但是，二里头文化酒具却在各地多有发现。墓葬随葬品中最常见的就是酒具。酒具的种类繁多，如饮酒的爵、觚、杯，温酒、斟酒的盃、鬯、斚，盛酒的各种尊、罍等。

在二里头遗址车辙的发现，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有了双轮车，其轨距（约1.2米）与在偃师商城发现的商代早期车辙大致相当。

在二里头遗址多次发现海贝、骨贝、石贝、蚌贝。贝在当时仅仅作作为装饰品，抑或已具有一般等价物的社会功能，尚待研究。

3. 精神文化

有学者认为^[119]：二里头文化或夏代有没有文字？这是学术界探讨已久的问题。根据目前的资料，认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一批表意的语言符号，可称为文字。二里头文化至今尚未发现可以确认的成篇文字。

龙山时代已经流行占卜，二里头文化承袭了这种文化传统。二里头文化占卜用品，目前只发现兽脾，而未发现可确认的卜甲，其卜骨，有羊、牛、猪、鹿的肩胛骨。所有的卜骨，一般都只有灼痕而无钻、凿痕迹。

二里头文化的人们相信人死有灵并崇拜死去的祖先，最有力的证据是建有规模宏大的宗庙。二里头遗址的二号宫殿，既有大殿、廊庑，又有一座大墓。大墓位于主殿的背后，居于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一般认为，二号宫殿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即宗庙。二里头遗址发现多处与祭祀有关的建筑基址，或即坛、埴类建筑。坛和埴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祭祀场所。

在举行祭祀或其他仪式活动时，往往使用乐器。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乐器有陶鼓模型、漆鼓、陶铃、铜铃、陶埴和石磬等。

4. 社会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邹衡即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并认为夏文化早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的文化面貌及其生产水平，同其前驱——河南龙山文化是差不多的，二里头一期大概还处于青铜器的开创阶段，到二里头二期偏晚，青铜器才有了初步的发展，出现了铜礼器。夏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无论从其生产水平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集中表现，就是宗庙建筑的修建，在生产技术上一个突出的进步，就是青铜器的铸造。现在考古学上发现的夏文化，距今恰恰将近四千年，正值中国文明开始的时期，也是中国最早建立国家的时期，即历史上的夏王朝时期^[120]。

五、小结与展望

（一）小结

考古学界一般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形成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中国考古学的持续发展时期。可以参考中国考古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对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研究史做一小结。

有学者指出^[12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广泛积累材料,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大量新的考古学文化被发现,原本即不清楚的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复杂。由此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以探索考古学文化时空关系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史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并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但这一时期也不乏一些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其中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动性考古工作是 1959 年夏徐旭生豫西夏文化的调查。他首先梳理历史文献,寻找线索,然后据此开展考古调查,获得成功,一次调查即发现了后来证实对探索夏文化极为重要的早期都城遗址二里头和王城岗。这项工作揭开了新时期考古学探寻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是有效利用文献指引田野考古的典范。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材料,为初步建立考古学时空框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一些重大考古发现如各地的史前城址、贵族墓地、大型建筑等,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思考和建设开始活跃起来。首先是苏秉琦在总结各地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区系类型理论。与新石器时代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相似的是这一时期夏商周考古文化谱系的研究也倍受关注。继徐旭生豫西调查夏墟之后,随着二里头的发现,有关什么是夏文化,什么是夏商文化的分界等问题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广泛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的对应关系问题。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夏商周考古年代学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套考古学文化分期分区体系,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与传统的文献记载的三代编年体系的对应问题,再加上日益积累的碳十四绝对年代,使三套年代框架在整合的过程中常常是故此失彼、难以周全,其中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复

杂。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开始从物质文化史逐步转移到社会的层面,聚落考古兴起,由对聚落形态演变的考察讨论社会复杂化过程和文明化演进的道路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重点。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性思索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文明起源轨迹的特殊性方面。其中,有代表性且影响巨大的有苏秉琦的文明起源三步曲与三模式理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理论和以中原为中心历史发展趋势形成过程的思考。90 年代以来,以建立夏商周三代年代框架为目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随着大量新的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学的实践中,以科技考古命名的交叉学科大量出现,考古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比如对人地关系的环境考古研究,对资源生计的动植物考古研究,对生产技术的手工业考古研究等。在这种情况下,以考古学为基础,以上述文明起源理论为指导,以各种现代科技手段为支撑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出现,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2) 展望

我们可以考古学科在“十二五”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指南,对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研究做一展望^[122]: 1. 对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区研究,鼓励对考古学文化开展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2. 聚落形态的考古学研究,聚落形态研究是复原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3. 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对于这个过程的研究,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课题,也需要将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看待; 4.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在三代考古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领域; 5. 古代墓葬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墓葬和墓地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是中国考古学历来最为重视的领域; 6. 古代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手工业不但是古代科学技术发

展的直观写照,更是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7. 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如小麦、冶金术等,皆表明中西方的交流由来已久。

以上诸课题,可以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研究的重要方面和主攻方向。让我们在新的探索中共同期待新的收获。

- [1] 严文明.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文物, 1981, (6): 41~48. 严文明.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史前研究, 1984, (1): 36~44.
- [2] 梁思永. 后冈发掘小记. 安阳发掘报告(第4册). 1933: 609~625; 又载: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99~106.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68.
- [5] 同[4]: 69~85.
-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考古四十年 1952~1992.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117~151.
- [7] 杨育彬, 袁广阔. 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226~275.
- [8] 同[3]: 510~588.
- [9]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庙底沟与三里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 [10]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61, (4): 175~178.
- [11] 同[4]: 70.
- [13] 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200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20~25.
- [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灵宝涧口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89, (4): 10~47.
- [1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洛阳王湾.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42~68.
- [16]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 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6~156.
-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 考古, 1964, (1): 30~35.
- [1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 考古, 1982, (5): 460~462.
- [19]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79, (3): 301~374.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 郑州大河村遗址 1983、1987 年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96, (1): 111~141.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大河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2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87, (2): 3~46.
- [2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9 文物考古年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0 文物考古年报.
- [2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登封告成北沟遗址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 1984, (4): 9~12.
- [23] [4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1983, (3): 37~48.
- [24] 曹桂岑. 郾城段寨遗址试掘. 中原文物, 1981, (3): 4~8.
- [25] [6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1989, (1): 1~14.
- [26] [61]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集刊第3集, 1983: 1~50.
- [27] 李文杰. 试论青龙泉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11~20.
- [28] 同[3]: 519.
- [29] 同[3]: 519.
- [30] 王建华. 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20、288.
- [31] 同[30]: 347~438.
- [32] 同[30]: 287.
- [33] 同[3]: 524.
- [34] 李济. 小屯与仰韶. 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抽印本). 1930. 李景琳. 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 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 1947: 83~120.
- [35] 同[3]: 528.
- [36] 梁思永. 小屯、龙山与仰韶.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91~98.
- [37] 安志敏. 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 考古, 1959, (10): 559~565. 石兴邦. 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 考古, 1959, (10): 566~570.
- [38] 同[4]: 69~85.
- [39] 严文明. 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 文物, 1981, (6): 41~48.
- [40] 李伯谦. 二里头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 文物, 1986, (6): 41~47. 韩建业等.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 考古学报, 1997, (1): 1~21.

- [41] 邹衡.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物, 1979, (3): 64~69. 邹衡. 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95~182.
- [42] 同 [15]: 69~96.
- [4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 [44] [7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7.
- [4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禹州瓦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4. 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大型聚落. 2008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34~37. 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 2010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33~36.
-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02, (2): 53~82.
- [48] 洛阳博物馆.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 考古, 1975, (5): 285~2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2, (4): 427~47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临汝煤山遗址 1987~1988 年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1, (3): 5~23.
- [4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鄆城郝家台遗址发掘. 华夏考古, 1992, (3): 62~91.
- [50] [11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2008, (5): 32~49.
- [51] 王震中. 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53~174.
- [52] 董琦. 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2. 董琦. 虞夏时期的中原.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53] [58] 韩建业, 杨新改.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 考古学报, 1997, (1): 1~21.
- [54] 同 [3]: 534.
- [55] [63] [69] [102] 方燕明. 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¹⁴C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 中原文物, 2005, (2): 18~32. 又收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Ⅰ)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439~461.
- [56] 安金槐. 试论河南“龙山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153~160.
- [57] 高天麟, 孟凡人. 试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 中原文物, 1983, (2): 15~21.
- [59] 同 [3]: 535、536.
- [60] 梁思永. 后冈发掘小记. 安阳发掘报告(第4册). 1933: 609~6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2 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 考古, 1972, (5): 8~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82, (6): 565~58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9 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5, (1): 33~87.
- [6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辉县孟庄.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 [64] 同 [4]: 75.
-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等. 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集刊(第5集). 1987: 79~119.
- [6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河南淮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 1983, (3): 21~36.
- [68]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等. 豫东杞县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22~87.
- [7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庙底沟与三里桥.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三门峡市三里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清代墓葬. 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6.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273~275.
- [7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浙川下王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230~263. 河南省文物局.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年报[2009-2010].
- [72]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0, (3): 1~64. 河南淅川龙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2010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29~32. 河南省文物局. 河南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年报[2009-2010].
- [73] [115] 河南淅川下寨新石器至夏代遗址. 2010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45~49.
- [74] 刘绪. 谈一个与早期文明相关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20~25.
- [75] 同 [30]: 120、289~293.
- [76] [80] 赵辉. 中华文明的曙光. 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1~94. 又收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Ⅰ)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34~77.
- [78] 刘昶, 方燕明.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南方文物, 2010, (4): 55~64. 王树芝,

- 方燕明, 赵志军. 龙山时代的植物、古气候及植物利用——以河南瓦店遗址的木炭分析为例. 第四纪研究, 2012, 34 (2): 226~235.
- [79] 同 [4]: 85.
-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81, (5): 398~408. 赵芝荃. 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13~17.
- [8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 华夏考古, 2000, (4): 3~10.
- [83]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 文物, 2004, (3): 4~20.
- [8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 考古, 2009, (2): 3~15.
-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 考古, 2009, (2): 16~31.
- [8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城址中心区发现大型浅穴式建筑. 考古, 2006, (1):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新砦队等.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 考古, 2009, (2): 32~47.
- [87] 李维明. 二里头一期文化与夏文化初始. 中原文物, 2002, (1): 33~42.
- [88] 赵芝荃. 夏代前期文化综论. 考古学报, 2003, (4): 459~482.
- [89] 杜金鹏. 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2001, (2). 又收入: 夏商周考古学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4~20.
- [9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 考古, 2005, (6): 3~6.
- [91] [1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1.
- [92]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 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520.
- [93]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 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赵春青. 新砦聚落考古的实践与方法. 考古, 2009, (2): 38~54.
- [94] 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 文物, 1954, (6): 18~24.
- [95] 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 文物, 1957, (10): 48~51.
- [9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1.
- [97] 夏鼐. 新中国的考古学. 考古, 1962, (9): 453~458.
- [98] 夏鼐. 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考古, 1977, (4): 217.
- [99] 徐旭生. 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考古, 1959, (11): 592~600.
- [10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试掘简报. 考古, 1961, (2): 28~85.
- [101] [103] 杜金鹏, 许宏. 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前言.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10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 考古, 1996, (12): 36~43.
- [106] 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 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53~5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大师姑2002~2003.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107] 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 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54~57.
-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 夏县东下冯.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109]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 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2, (1): 1~27.
- [110] 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河南杞县牛角岗遗址试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2, (1): 6~35.
- [111] 同 [68]: 191~237.
- [112]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92~204.
- [11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浙川下王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264~306.
- [116] [118] [119] 许宏. 最早的中国.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117] 同 [30]: 353~355.
- [120] 邹衡. 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95~182.
- [121] 张海.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 华夏考古, 2011, (4): 137~145.
- [122]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 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 南方文物, 2011, (1): 1~12.

(责任编辑: 辛 革)

河南
龙山时代城址
和中心聚落



1. 登封王城岗遗址



2. 新密古城寨遗址



3. 禹州瓦店遗址发掘现场



河南
龙山时代和
早期青铜时代
遗存

1. 新密新砦遗址建筑基址



2. 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绿松石龙



3. 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